

车 向 忱 传 略
(中共党史人物传略初稿)

施文魁 车树实

沈阳师范学院
1982年9月

车向忱传略

(中共党史人物传略初稿)

施文魁 车树实

优秀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坚强的爱国主义战士。我国著名的教育家、社会活动家车向忱。原名庆和。字向忱。男。生于一八九八年五月七日。逝世于一九七一年一月八日。

一、忧国忧民的青少年时代

车向忱的家乡。位于东北平原辽河西岸法库县的一个农村——东顾家房身村。他的曾祖父是从山东逃荒来的难民。传到祖父这辈。已成为经营三十多垧土地。供养着二十多口人的一个大家庭。父亲车文笏是个读书人。民国初年。担任过法库县东二乡的乡董。当时。通江口一带。辽河洪水连年泛滥。庄稼棵粒不收。灾荒遍地。饥民外逃。车文笏主动承担了兴修辽河大堤的任务。甚至不惜卖掉自己家里的土地。筹集资金。修筑河堤。通江口一带的百姓由于这一辽河大堤的建成。开始能够种上地。吃上饭。他们特地送来匾额一块。上写《谨怀饥溺》四个大字。表达了灾区人民的感激心情。这件事。对于已经懂事的向忱有着深刻的影响。

中日甲午战争以后。帝国主义不断向中国扩大侵略。就在康有为、梁启超宣传变法维新的同时。孙中山创立了兴中会。提出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开始了反对清政府的革命活动。这一新兴的革命浪潮冲击着古老的中国大地。也波及到辽河平原上这个小小的村庄。一九〇九年。车文笏从外地请来一位提倡维新。倾向革命的符子权老先生担

任校长。在本村办起了一所时势小学堂。十二岁的向忱十分高兴地进入了这所小学堂学习。符子权校长常向学生们讲些英雄人物反抗异族侵略的故事，并指导学生们看些重气节、爱祖国的书。文天祥、史可法、岳飞，以及林则徐、邓世昌等这样一些时势创造的英雄形象，深深地铭刻在向忱的心目中。这使得向忱从小就产生了爱慕英雄、学习英雄、为振兴中华争当英雄的强烈愿望。

向忱十七岁入法库县中学读书。二十一岁毕业。当时，由于父母之命已经完婚（妻翟重光，僱农家庭妇女），但是，关心国家兴亡，求学上进的心情仍然十分强烈。由于多次要求，经父亲同意，遂去北京报考大学。那时，蔡元培担任校长的北京大学是进步思潮的中心，向忱毫不犹豫地报考了这所向往已久的学校。经过考试，未被录取。但是，他并不灰心，遂入该校高等补习班学习。

当时，北京正处在一场革命风暴即将来临的前夕，要求废除卖国条约，收回领土主权的学生爱国运动已经开始。各校学生救国会的组织建立了，平民教育讲演团的学生们也正在走街串巷进行宣传。向忱一面补习功课，一面积极地参加讲演团的活动。

一九一九年五月三日的夜晚，北京大学的校园沸腾了。为了要求政府拒绝在和约上签字，为了外争国权，内除国贼，同学们都积极行动起来。准备明日早晨去天安门参加集会，游行示威。当时，正在高等补习班学习的向忱，立即放下手中的功课，投入到同学们的活动之中。

夜深了，一位同学对向忱说：“咱们是补习班的，别去参加游行示威了，免得耽误了功课。”向忱却毫不犹豫地回答道：“国都要亡了，还念什么书。”

第二天清晨，向忱毅然加入了北京大学学生们的队伍，冲出军警的

阻拦，奔向天安门前。浩浩荡荡的游行示威队伍，经过美国使馆、日本使馆，直抵卖国贼曹汝霖的住宅——赵家楼。曹汝霖是当时外交部的次长，又是二十一条卖国条约的签字人。爱国青年们真想把他碎尸万段，以解心头之恨。经过一番搜查，发现这个老奸巨滑的家伙溜掉了。群众愤怒极了，砸毁了他的全部家俱，并决定火烧赵家楼。向忱和一些同学“愤怒地划着了火柴。”正当越干越起劲的时候，突然，他们被军警包围了。于是，三十多名同学被捕，向忱也在其中。后来，由于广大群众的积极声援，被捕的同学才被释放。

这次空前规模的学生爱国运动，使向忱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政治教育，他看清了这些反动统治者丧权辱国的真面目，深深感到，“对于这些反动统治者，只有依靠群众同他们进行针锋相对地斗争，才能赢得胜利。”

高等补习班学习结束后，向忱考入中国大学。入学后，根据父亲的意见，进入该校法科一年级学习。

中国大学是孙中山担任名誉校长的一所大学。孙中山的革命精神和“唤起民众”、“恢复中华”的伟大号召，给予向忱极为深刻的影响。向忱在法科学习，目睹现实使他深深地感到，法律是为当权者辩护的，因此，越学越不感兴趣，尤其是什么“为官之道”、“仕途经济”等等，更不合乎自己的口味。结果，学习不到一年，他便不经父亲的同意，私自考入中国大学哲学系，立志学习哲学和教育，准备将来要为改造社会，挽救国家的危亡而工作。

当时，“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了民主与科学两个口号。民主与专制是对立的，科学与迷信是对立的。向忱认为，中国几千年的迷信思想是维护封建专制的精神支柱，也是“社会上最深、最大、还最久的病源。因此，在学生时代，他就把打破迷信，唤醒民众，当作自己为改造社会

所应尽的神圣职责。

从一九二一年初开始，向忱就在广泛搜集材料的基础上，每日课余总要腾出一两小时，运用现代的科学知识，写一两段对于封建迷信思想的批判。他常对周围的同学们说，“我国劳苦同胞与知识阶级是不平等的，他们缺乏文化知识，乃是封建迷信得以传播的基础。如今，开导这些知识薄弱同胞的责任，也就落在我们的肩上了。”他时时想着自己是为劳苦同胞写作，于是费尽心机，逐段逐句逐字地斟酌，有时常常几天不能自决，唯恐别人看时不能一目了然。

经过两年地辛勤劳动，终于在一九二三年初完成了一部三万七千多字的书稿，还亲自提写了书名《打破迷信》。可是，在那腐败，愚昧，反动，黑暗的社会，又有谁肯为劳苦同胞出版这本不挣钱的书呢？向忱本着“不干则已，一干到底”的精神，自己拿出两年来省吃俭用节省下来的学费，决定将书稿交由北京第一监狱的印刷厂印制一千册，书的末页上还特别注明，“欢迎翻印”。

这个破除迷信，普及科学知识的小册子刊印出来后，便在劳苦大众中廉价出售，可是销路不畅，这时，卖不出书钱，自己的生活也就更苦了。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全靠吃窝窝头度日。

广大劳苦民众不仅没有钱买书，而且，还有不识字没文化的实际困难。为了提高劳苦民众的文化，向忱就在写书的同时，还与几位志同道合的同学办起了中国大学平民夜校，并亲自担任夜校主任。平民夜校本着，不要学费、杂费、书费，夜间上学的原则，广泛招收本校的工人、职员、家属和附近的居民，学习国文、算术、常识等，四个月一期，最初为一个班，很快便发展成六个班，后来还有了中学班。《中国大学十六周年纪念大会公刊》中，曾对向忱团结有志青年，在没钱没书的条件

下艰苦创办起来的平民夜校作了如下记载。“查本校平民学校创设最早，中小各部，斐然可观。此虽不足以言普及，然若各地仿行，持之以久，未始非唤起民众之一法也。”（见《会刊》第59页）

二、狂热的爱国者——“东北甘地”

一九二五年，向忱从北京中国大学毕业，回到了家乡。当时，父亲主张寻找张作霖的总参议杨宇廷（与车家有点亲戚关系）作个县长。可是，向忱十分鄙视升官发财的道路和杨的为人，于是，毅然决然地违背了家长的主张，来到了沈阳（当时叫奉天）。他准备要为唤醒民众，挽救国家的危亡大干一番。

当时的沈阳城，一下火车，便是富丽堂皇的日本站，紧靠车站又是一条热闹繁华的日本街，日本商品充塞了市场，日本浪人任意横行霸道，到处都设有日本的商会、洋行、旅馆、附属地，以及毒害中国同胞的大烟馆、吗啡馆，和专供日本人寻欢作乐的舞厅、妓女院等等。向忱见此情景痛心疾首！他想，如今，东北已在日寇掠夺、虎视之下，要想救国先要救民，要想救民先要教民，于是，他寻得一家小店住下，立即开始为实现平民教育的理想而奔走。

他寻访友人援助，未能见面，拜见商会会长请求支持，没有结果。各个教育机关，同善堂、道德会，他都走遍了，也无济于事。真是东撞一头，西撞一头，不知不觉已四十余日，眼看店费快要用完了。恰在这时，询问到大南门里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清末由丹麦人师度尔发起创立）的总干事阎宝航（又名阎玉衡）非常热心社会事业，向忱便决定登门拜访。他与阎宝航会面一谈，非常投合，立即认作同志和知己，并决定以青年会为据点，着手开展平民教育的活动。

经过紧张的筹划之后，向忱首先在小南关第一监狱创办了第一所平民学校。冬季，他应聘为省立第三高中的教员，于是，又在该校创立平民夜校两个班。第二年夏季，兼任东北大学附属中学和第一高中教员，又在两校各设立平民夜校一个班。不仅如此，向忱还联络大中学生，成立奉天学生平民服务团，利用节假日，亲自带领学生到城市贫民和乡村农民中去，“真实地作平民的朋友”，大力兴办平民夜校。向忱白天在中学教书，晚上，便骑着自行车到各个平民夜校去视察，有时还亲自授课。

可是，办这样多的平民学校，经费从哪里来呢？除了青年会补助一小部分外，主要靠募捐和向忱自己的薪水维持。他在三所中学兼课，每月薪水九十多块现大洋，几乎全部用来给学生购买课本、铅笔、纸张，而自己和家属却过着省吃俭用的生活。家中有时断炊，孩子饿的哭泣，妻子前来要钱买米，他还得临时向别人借钱。

随着平民教育事业的发展，向忱又联合各界热心人士，于一九二八年九月二十三日成立了奉天平民教育促进会，他亲自担任了该会的总干事。

可是，这样提倡平民教育的活动，并不是人们都能理解接受的。第一高中的校长看到向忱这样热心鼓动学生参加平民教育的社会活动，便将向忱解聘了。不久，第三中学也照此办理。于是，向忱每月仅剩东大附中教师的工薪收入。这时，平民教育的事业还要继续发展，困难就更为严重了。可是，向忱并不屈服，还对会员们说：“工作开展了，经济上的困难会越来越多的。只要我们本着不怕穷、不怕苦、不怕死，实干、苦干、硬干的精神去做，困难一定能够克服。只要我们不被冻死、饿死，我们绝不放弃工作。”

为时不长。当时的伪教育厅长又诬蔑向忱说。“这是拉拢青年，有左倾嫌疑。”甚至跑到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张学良那里诬告说，“办平民教育就是反对贵族，也就是反对政府，反对张学良。”向忱得知这一消息，便求东大附中的学生张学思帮忙，引见其兄张学良。他见到张学良后，便直率地说，“办平民教育是为了唤醒民众，反对日本侵略。”张学良一听，十分高兴，便说，“反对日本侵略，很好，你可以继续办下去！”过后不久，张学良还捐助现大洋五千元，并应向忱的邀请，兼任了平民教育促进会（后改为辽宁国民简易教育协进会）的名誉会长。就这样，直到一九二九年七月，辽宁全省共办起城市平民学校41所，学生一千七百余，农村平民学校二百多所，波及二十余县，使全省七千多名不识字的农民群众初步获得了读书的机会，广大受教育的劳苦大众纷纷表示，“不做睁眼瞎，增强爱国心，不当亡国奴！”

一九二九年夏，日本政府见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归附了南京政府，便在加强商品输出，经济掠夺的同时，增兵东北，准备进行军事侵略。在此形势下，向忱为进一步唤起民众，以实际行动反对日本侵略，又与阎宝航、张希尧、张金辉、王恂臣、宋黎等，共同发起成立了辽宁国民常识促进会，并被大家公推为主任干事，负责日常工作。

辽宁国民常识促进会是“以灌输常识造就健全国民为宗旨”的群众性爱国反日团体。沈阳各大中学校的学生踊跃参加，并在向忱和全体委员的领导下，每逢星期天，节假日，便三五成群的分赴各个街头、茶社、剧院、监狱、福音堂等地进行反日爱国的讲演。当时，宣传活动中最主要的一项便是提倡国货，抵制日货。在工商界著名人士的支持下，向忱率领大中學生搜集了百余种国货，如春如公司的墨汁、钢笔水，瑞光公司的肥皂，惠临公司的火柴，老火车头牌的牙粉，以及土布、乾电池。

以盆等。此外，向忱为抵制日纱、日布，还自费从北京引进了一次能纺40支纱的手摇纺纱机一部，为抵制洋油灯还研究制造了能够自动供油的带罩豆油灯等，进行广泛的宣传提倡。几乎每个星期日，各个街头、茶社、青年会、小河沿公园的水亭子上，都有许多身穿国产衣帽鞋袜的大中学生，在展览国货的同时，热情地进行宣传。他们说，“买洋货，钱就叫外国人赚去了，就象人身上的血脉似的，老叫别人把血脉抽走，这个人就快该死了，一个国家叫外国人用洋货不断的把金钱赚走，这个国家就会灭亡，老百姓就会成为亡国奴了，亡国奴不如丧家犬。”

由于提倡国货的宣传普遍全省五十余县，促进了国货贸易，外市县各门货商也都纷纷来到国民常识促进会与向忱接洽国货宣传事宜，为了进一步做好提倡国货的工作，向忱又于一九三〇年十月着手筹备建立国货公司。

在提倡国货、抵制日货的同时，向忱还兼管着拒毒协会的日常工作，他亲自带领会员化装潜入日本站、十间房（西塔东）一带日本浪人开设的大烟馆、吗啡馆等毒密进行实地调查、拍照，然后据此编写逼真的宣传材料，演出生动的宣传剧目。他还邀请著名画家创作了许多宣传画，并带领会员上街张贴。在拒毒禁烟的活动中，最突出的要算是一九三〇年三月十日和六月十六日，分别两次在小河沿公共体育场焚烧鸦片的举动。那还是一九二九年年末，省邮政局扣留了日本人贩运的海洛因、鸦片386包，烟土400箱。在广大群众的要求下，省政府决定全部焚毁。国民常识促进会、拒毒会负责人车向忱与阎宝航等为这次活动作了大量准备工作。他们动员了数百名学生前去讲演、宣传、维持秩序。焚烧毒品的当天，烟露蔽天，人人称快。广大群众振臂高呼：

打倒帝国主义！

彻底粉碎帝国主义纵毒祸华的阴谋！

这些反日爱国活动大长了中国人的志气。同时，也引起了日寇的仇视。日本当局支使一些浪人采取了卑鄙的手段，对向忱及其家属进行威胁吓。可是，向忱毫不惧怕，依然坚定地对会员说，“我们在必要的时候都应该像文天祥、史可法那样，洒鲜血，抛头颅，宁死不当亡国奴！还说“我一个人死去，如果能换来千万人的觉醒和幸福，那我马上可以去死！”由于这种不怕穷、不怕苦、不怕死、实干、苦干、硬干的反日爱国精神，与当时印度反帝爱国的民族运动领袖“甘地”十分相似。因而，大家都赞誉向忱，称他为“东北甘地”。

一九三〇年末，日本帝国主义进行军事入侵的形势越来越紧张了。当向忱听说日本关东军要在我辽河上游铁岭县马蓬沟要道上建筑兵营，妄图控制辽河包围沈阳的消息，立即派遣张希尧、黄宇宙等化装深入当地百姓之中进行调查，并动员群众拒绝为日本出工、当劳工。同时，又以当地群众的名义，向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写信表示抗议。经过各种形式的斗争，这座日本关东军的兵营始终未能建成。

一九三一年七月，日本当局蓄意制造的万宝山惨案发生了。为了调查事件的真相，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向忱同张希尧等化装前往长春万宝山进行调查。回到沈阳后，他又发动国民常识促进会的会员为救济旅朝受难同胞进行募捐。

“九一八”事变爆发的前夕，日本军队愈来愈频繁的军事演习，已使人们愈来愈明显的意识到，一场深重的民族灾难即将来临。向忱和国民常识促进会的会员们越发加紧工作，加紧斗争。由他亲自筹办的国货公司，由小河沿迁至钟楼南路西消费合作社旧址，原定十五日开幕，提前于十二日开幕了。为便于更好地开展活动，国民常识促进会也由青年会馆迁到省教育会院内。准备在国庆日举办的拒毒宣传、民众夜校的招

生。国货陈列馆的展出等工作，都在紧张地进行中。

可是，远水已救不得近火了。就在日本驻军以演习的名义向我沈阳驻军第七旅的营房——北大营不断制造挑衅事件的紧要关头，向忱与张希尧亲自来到北大营面见老朋友，——第七旅的王以哲旅长，向忱说明来意，希望王旅长尽快作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王以哲立即拿出了张学良将军从北平发来的，转述蒋委员长“暂不抵抗”的命令。向忱看过，十分激愤的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并劝导王旅长说，“一旦日寇开了火，你如果敢抵抗，只要坚持三天，我们马上组织义勇军支援你，在群众方面发动二、三万人抗日是不成问题的。”

王以哲述说了自己的苦衷，并表示已作了“见机行事”的安排，还准备再向上级请示。

九月十八日晚十时二十分，从南满车站与大和旅馆的日军炮兵阵地向北大营开炮射击了。东北人民的灾难，中华民族的灾难——“九一八”事变降临了。

事变后的第二天，战斗仍在继续。日寇正在中国的土地上烧杀奸淫，东北的同胞们在流血、牺牲。国民常识促进会、平民学校、国货公司等全被彻底捣毁。依靠提倡教育、振兴实业、和鼓励东北军抵抗日寇的种种努力都已化为泡影。向忱内心悲愤万分。他想，我们决不能听任日寇欺凌宰割。于是，联合了东北大学的爱国同学张希尧、苗可秀、张金辉、高明、宋黎等四十余人，怀着驱逐日寇、收复失地的急切愿望，告别了已是一片火海的沈阳，分头秘密登上火车，奔赴北平。

三、抗日救国活动

到达北平后，向忱立即同先后来的东北同乡高崇民、阎宝航、陈先舟、卢广绩等商量、研究，决定共同发起建立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简称救国会）。这个以“抵抗日人侵略，共谋收复失地，保护主权”为宗旨的，群众性反日救国团体，于九月二十七日在北平旧刑部街奉天会馆内正式成立。张学良副司令在精神上、物质上都给予了大力支持。流亡关内的东北同胞踊跃参加，入会者达四百多人。向忱被选为执行委员、常委。

救国会成立后，最紧迫的任务便是开展抗日宣传和组织人民抗日的武装斗争。十月初，向忱领导了一个宣传组，前往山海关、绥中、兴城等地，深入当地群众，控诉日寇侵略东北的罪行，号召群众行动起来，作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不当亡国奴。

为了督促南京国民党政府出兵收复东北失地，救国会又决定组成六百多人的请愿团，赴南京请愿。向忱率领杨毓秀、莽大林、任子平等七人直接求见蒋介石。当时，真如‘哭秦庭’一般，可是蒋介石拒不接见，一直等了五、六天。向忱等实在无奈，便再次面见总秘书长贺衷寒，气愤地说：“请转告司令（指蒋介石），如果打算要我们东北的话，就得接见，若是不管东北的话，那么，我们马上就走。”结果不得已，在第二天才答应接见。

在戒备森严的国民党中央党部的客厅里，向忱代表请愿团慷慨激昂地陈述了：“出兵抵抗日寇侵略，收复东北失地”、“供给东北军军火”、“援助东北抗日义勇军”、“团结爱国力量，一致抗日”、“中苏复交”等七项要求。蒋介石却虚伪傲慢，不负责任地答复说：“阿拉（我）对东北人民很关心的，但是阿拉很忙啊！没有时间答复，你们去找陈立天

好了。”这前后不到五分钟的接见，便毫无结果的不了了之。通过这次请愿，向忱与参加请愿的同胞都彻底看清了蒋介石国民党决心出卖东北的真面目。大家获得了一个共同的认识和决心——不能再有任何幻想了，他们决心不要东北了，那么，我们自己去干吧！

十二月下旬，日寇集中兵力向我辽宁省政府临时所在地锦州发起进攻，向忱与苗可秀等率领救国会慰问团赴该地区田庄台前线慰劳抗敌将士。回到北京后，为训练出关抗日的青年，又与张希尧、高明、苗可秀等联合由沈阳逃出的东大同学一百多人，组成了东北学生军，编为一个连。向忱不仅参加学生军的领导工作，关怀学员们的学习生活，还请求张学良从东北军中派两名教官，前来讲授军事知识，进行军事训练。

在此同时，已沦陷的东北三省广大的工农群众和爱国知识分子纷纷揭竿而起，挥动大刀、长矛、土炮、洋枪，组成了以部分原东北军为基础的抗日爱国武装力量——东北抗日义勇军。但是他们没有统一的领导，也没有巩固的后方，急需内地支援。在此形势下，向忱自报奋勇，不畏艰险，要求出关潜入敌后，联络抗日义勇军。救国会为此作出决定，张学良也亲自接见面谈。向忱将救国会的委任状和张学良亲笔写在白绸子上面的信件秘密藏在身上。一九三二年二月初，向忱改名杨秀东，化装为卖药先生，与扮作徒弟宋黎、李述全一同由北平到天津，从天津塘沽港口乘日轮“天潮丸”，前往已被日寇占领的城市——大连。

从大连登岸，还未下船，当即遭到日本警特的怀疑、检查，向忱突然精神紧张，心想，这可糟了！但一转念，觉得自己能为东北三千万父老而死，死亦光荣，于是，马上镇静下来。下船后，向忱被押解至水上警察公署进行详细盘查。审问，前后经过三个多小时，未发现破绽，才被释放。

向忱脱离虎口后，按照预定计划，经庄河、安东（今丹东）、凤城，寻见了义勇军将领邓铁梅。他代表救国会表示慰问，祝贺邓不断取得的胜利，还将救国会加委的东北义勇军第二十八路司令的委任状交给了邓铁梅，并商定介绍苗可秀作邓的秘书长。邓铁梅也决定派出参谋长王兆麟为驻北平救国会代表。然后，向忱又从凤城经安东、宽甸、桓仁、辑安（集安）、通化，到临江策划组织抗日武装，建立秘密抗日小组。在临江县八道江寻见了义勇军将领唐聚五，进行慰问并鼓励他坚决抗日。然后由临江经开原到达哈尔滨，寻访义勇军将领李杜。后因李杜退至朱河一带，又追到朱河见到李杜将军。向忱在进行慰问的同时，还讲述了国内人民的希望，并把救国会与张学良将军的信件交给他，鼓励他再接再厉打击日寇。

次日，回哈尔滨转齐齐哈尔寻访义勇军将领马占山。当听说马占山在“江桥之战”狠狠地打击了日寇之后，曾一度投降，后来又出走反正，现已退至大黑河一带。于是，向忱又化装成农民，立即开始了这段艰苦的行程。由齐齐哈尔乘火车到纳河，由纳河进入冰雪覆盖着的大兴安岭森林，就只得步行了。不幸路上遇见土匪，将向忱的路费抢劫一空。于是，他便忍饥受冻，沿路讨饭前进。一天，从一家老大娘那里讨来了半碗带冰碴的小米饭，因为饥饿，也只好强吞下去。可是，不多时，胃痛难忍，无可奈何，急走十里出了汗，胃暖了，疼方止（从此，落了个着凉肚子疼的病根）。整日步行在荒无人烟、虎豹出没的大兴安岭森林，向忱望着那遮天蔽日的苍松翠柏，不由得回想起幼年时读过的诗句：“国破山河在，春城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这亡国的奇耻大辱，血海深仇，给自己增添了前进的勇气和力量。就这样，饥寒饱尝，陪历艰辛，经过十日之久，到达大黑河。

在大黑河的官银号，即义勇军的司令部内见到了马占山将军。向忱说明自己是代表救国会前来慰问的，接着又从棉袄中拆出委任状和张学良将军的亲笔信件。马占山见信后十分激动，老泪纵横，随即召开阅兵大会，宣誓反攻，并请向忱给全体将士讲话，鼓励大家抗日到底。通过这次慰问，向忱还勾通了李杜有粮食无子弹，马占山有子弹无粮食的情况，促使他们彼此交流，以便坚持。

完成这一任务后，向忱又根据马占山提供的情况，前往海伦、拜泉、安达等地联络马的部下邓文、李海清等，促他们与马南北策应，夹击齐齐哈尔市的日寇。不久，返回北平汇报情况，然后又回到哈尔滨。

同年七月，根据救国会的意见，为掩护来往的抗日同志，秘密为义勇军战士治疗伤病，决定在哈尔滨道外十六道街筹备开设大同疗养院。年末，日寇宪兵破获了大同疗养院，并悬赏五千金票购买向忱的头颅。于是，向忱又潜赴满州里、海拉尔，寻访苏炳文，推动其联合抗日，并往绥芬河一带策动伪军反正。不久，逐返北平汇报工作。

通过近一年来深入敌后，联络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活动，向忱亲眼看到不愿作奴隶的广大东北人民，他们日夜怀念祖国，盼望祖国出兵收复失地，纷纷主动要求参加抗日工作。广大义勇军战士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孤军作战，但是，非常勇敢顽强。同时，他也看到，这些以东北军为基础的抗日义勇军，由于没有坚强的领导，他们思想动摇，各自为政，彼此观望，互不支援。因而，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这些极盛一时的各路抗日义勇军，大部都被日寇个个击破，相继溃败。与此同时，他也看到了在吉沈铁路中段盘石地区崛起了一支由中共党员杨靖宇所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二军南满游击队（简称南满游击队，即后来抗联的前身）。这是一支拥有数千人的坚强的抗日队伍。他们在极其困难恶劣的

条件下，卓有成效的打击日寇；他们急待祖国内地广大人民的支援。向忱向救国会汇报了这一情况。按照当时救国会的观点，凡是抗日的，都应该积极支持。可这究竟是共产党领导的部队，不便公开，于是救国会便把这杨靖宇部队（南满游击队）联络员的任务，秘密交给了向忱。

一九三三年初，向忱第三次潜回东北，来到了辽南地区。可是，到哪里去找共产党领导的部队呢？为此，他翻遍每天能够找到的敌伪报纸，看看那里打了仗？那里开“匪”多少？从而判断南满游击队的去向。经过一段查找，向忱终于在桓仁老秃顶子山见到了杨靖宇领导的部队，当即表示慰问并代表救国会商讨了援助步枪、子弹、手榴弹等事宜。同时，还确定通过给邓铁梅部队进行海上援助的路线，从东沟北井子上岸，接收地点定在宽甸县夹皮沟。这是向忱生平第一次接触了共产党领导的部队。他亲眼看到这些身穿缴获的日本鬼子服装，纪律严明，同日寇水乳交融，整日里爬冰卧雪，出没于山洞密林的红军战士，十分钦佩，十分感慨！尤其是从南满游击队那里听到了共产党对东北敌后抗日斗争形势的分析和各种抗日力量联合起来的主张，向忱觉得非常切合实际，非常合乎东北广大人民的愿望。他深受教育，深为感动，同时，也更加坚定了各种抗日力量必须联合起来的信念。向忱从南满游击队和这些战士们的身上看到了收复东北失地的希望。后来，他在一篇文章中曾经写道：“回忆起当年我所参加的这段抗日活动，没能使广大的义勇军得到政治上的指导，以致没有能使他们和东北抗日联军更好的联合在一起，以为坚强的抗日力量，这是很遗憾的事”。

离开辽南地区后，向忱又往黑龙江泰安等地寻找马占山的部下采善和、允江，还联络了“压满州”、“挡一面”、“李波澜”等山林支队，鼓动他们联合起来打击日寇。但当时的义勇军活动已是大势去矣。同时，

又得知救国会所领导的奉天总部已遭日寇警特破获，哈尔滨总部、庄河总部、西丰支部等业已暴露，于是，决定彻回北平。不久，向忱便携同妻子和不满周岁的老儿子作为掩护，经由山海关回到北平。

三月初，热河失守，日寇飞机轮番轰炸长城各口，驻守该地的东北军将士自动奋起抵抗，向忱同已是中共党员的张希尧，率领东大同学五十余人，代表救国会、辽吉黑后援会、北平妇女协会，带着大批慰劳品，前往抗日前线海阳镇、古北口南石匣镇慰劳抗日部队。慰劳团在向忱先垂范的影响下，不顾日寇飞机的狂轰滥炸，冒着枪林弹雨，抢救伤员二千五百多名。当时，在前线参战的中央军第二师黄杰师长，见此情景，都感到十分敬佩。此外，向忱还与中共党员董学礼组织抗日骑兵游击队，配合长城抗战。可是，身为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的何应钦却采取了袖手旁观，与日寇勾结的“国策”，致使我军不得不放弃长城各口，失掉了冀东。

就在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与日本帝国主义密谋签定卖国的《塘沽协定》期间，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六日，抗日将领冯玉祥、方振武、共产党员吉鸿昌等，以部分驻守长城的抗日军队，东北义勇军和平津救亡学生为基础，组织了察绥抗日同盟军，并在康保、宝昌、沽原一带抗击日寇，爆发了著名的“张北抗战”。为了鼓励抗日战士英勇杀敌，向忱又携同张希尧等赴张北前线慰问，并在那里结识了冯玉祥、吉鸿昌将军。他在张北前线又一次亲眼看到了由共产党参加领导的抗日军队英勇顽强的打击敌人，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可是，为时不久，这样真正抗日的部队却遭到蒋介石调来的十六个师的围剿。此事，对向忱是个沉重的打击。

这一时期，救国会内部的中共地下党员张希尧、郑江轩等常与向忱接触，并经常谈到“九一八”事变后国内抗日斗争的形势，谈到共产党